

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周恩来曾通过当时在延安的美军观察小组与美国政府联系,再三要求秘密飞赴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会谈。那么,这一计划又是如何搁浅的呢?

1945年,毛泽东想携周恩来秘密访美

周恩来首提高层接触被忽略

1944年夏天以来,在美国驻华各机构的一些重要官员中,要求美国政府与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的呼声日益增高。7月,美国组织了一个美军观察小组到达延安。

7月27日,周恩来会见美国观察组成员谢伟思,首次表达了愿意同美国进行高级别接触的意愿。当时谢伟思曾问:“您认为美国在帮助中国方面能做什么?”周恩来表示:“使人影响到我们影响的更好的办法,可能是通过高级别的个人接触。”不过,美方未能领会中方意思,或者有别的考虑,周恩来等人首次提议的高层接触不了了之。

毛泽东明确提出想访美

1944年12月15日,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等人造访延安,同行的还有美国战略情报局成员伯德。此前,中国战区司令魏德迈的参谋长莫克莱尔曾提出一个计划:美军在中共控制之下的延安登陆或空降伞兵,中共给予合作和支持;作为回报,美国将给中共军队提供装备。伯德此行主要是为此计划探听虚实。

15-17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相继与伯德等人进行会谈,并

就相关问题达成共识:美国部队将被安排到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中共用全部的65万部队和250万民兵予以配合;美国战略情报局将至少为2.5万名游击队提供食物、衣服的全副装备,为民兵至少配备10万支伍尔沃斯单发手枪,同时建立专门学校培训如何使用美国武器等。

毛泽东表示:配合美军的行动计划关系重大,他和周恩来应当到美国和罗斯福面谈。但莫克莱尔计划因遭到当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强烈反对而流产,毛泽东的访美提议也就泡汤了。

毛泽东再提访美计划

1945年1月初,毛泽东会见“迪克西使团”代理团长克劳姆莱少校,再次提出他愿意和周恩来一起或单独前往华盛顿面见罗斯福,而且要求把这一建议直接转给美方高层,而不要让亲蒋的赫尔利知晓。

1月9日,克劳姆莱把毛泽东这个提议如实向魏德迈在重庆的总部做了汇报。尽管克劳姆莱使用了密电,但赫尔利还是发现了。1月10日,密电发到重庆,但魏德迈恰好不在。魏德迈与赫尔利曾有互拆信件协议,于是信就落入了赫尔利手中。14日,赫尔利给罗斯福

总统发了一封长达6页的信件。在赫尔利看来,国民党才是中国正统,而中共军队根本不必予以重视,因此他坚决抵制装备中共与毛泽东访美这两项计划。由于赫尔利的“不懈努力”,毛泽东的第二次访美提议同样未能得到美方回应。

毛泽东三提访美计划

1945年3月间,谢伟思奉军方之命再次去延安。毛泽东向谢伟思表示,尽管美国的政策一贯举棋不定,使他感到迷惑不解,但他仍希望面对面地同罗斯福讨论所有这一切。

大使赫尔利对谢伟思延安之行同样大动肝火,气急败坏。3月27日,赫尔利同各军种参谋长举行了会晤,军种参谋长根据赫尔利的描述得出结论:“只要向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提供比较小的援助,中国的叛乱就能被镇压下去。”既然如此,同中共的接触就完全没有价值了。3月30日,谢伟思接到了返回美国的命令。

4月4日,谢伟思离开延安,12日抵达美国。当天,罗斯福总统去世。随着罗斯福的去世与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推行,毛泽东的第三次访美提议也被埋没了历史长河中。

(据《文史春秋》、《世纪行》)

董必武:“三不许”

董必武非常谦逊,他把自己的工作比喻为“三种行为”:当抹布、跑龙套、敲边鼓。1949年11月,董必武因公去南京,几位随员想把一辆“别克牌”黑色小车要来带回北京。董必武得知后,严肃郑重地提出“三不许”:不许向地方要东西,更不许以他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活动,不许接受礼物。从此,这个“约法三章”便成了董必武和他身边工作人员的防腐防变的座右铭。

任弼时:“三怕”

任弼时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任弼时戎马一生,征战南北,两次被捕入狱,体弱多病,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按理说,他应该享受更好的生活、更优越的服务。但他一点也没有追求享受,而是兢兢业业、鞠躬尽瘁。

彭德怀:“保公三诀”

抗美援朝期间,祖国人民给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寄去了许多慰问品,彭德怀吩咐警卫员全部收拢,分下去。对随意取用慰问品的干部则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说,管公的人就要这样:第一,自己不贪;第二,别人不送;第三,敢把厚脸皮、熟人挡回去。有这三条,才能保得住一个“公”字。并指示管理物资的干部一定要做到这三条。彭德怀说的这三条,人称“保公三诀”。

徐特立:“三个第一”

被尊称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是毛泽东的老师,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称其为党的“坚强的老战士”,评价他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这三个“第一”是毛泽东1937年11月30日在延安为徐特立60岁生日时写下的祝贺信中的核心观点,概括了徐特立光辉的一生。这位1927年5月在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并以57岁高龄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真正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模范实践者。令人回味的是,毛泽东在称赞徐特立“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同时,也尖锐指出了“有些人却是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

(本刊综合)

你不知道的重庆谈判细节

70年前的10月10日,国共两党经过长达43天的重庆谈判,签署了《双十协定》。关于这次谈判,有许多细节尚不为人知。

蒋介石咄咄逼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战终于结束。就在前一天,蒋介石给毛泽东发了一份邀请电函,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是由蒋介石首先发起的,一开始主动权确实在国民党政权一边。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第一份电报“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毛泽东回以“朱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敌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朱总司令电文提出的是受降程序未明问题。蒋介石立即抓住机会,对中共实施攻击,以受降办法系盟军总部规定,“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进而指责“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尤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并再次要求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中共回以“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但蒋介石仍坚持“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

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在中共还未做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决定之前,确实处被动地位,只能在国共双方层面交涉,而蒋介石是以国家和人民利益立意,声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并慷慨陈词,称“抗战八年,全国同胞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告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

面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攻势,中共复蒋介石第二电也只是“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盼”。当时国际国内舆论对中共也不利。《纽约时报》社论《中国共产党》一文,也称中国共产党不愿参加合作。国民政府发言人张群甚至直指中国共产党为“国民之公敌”。

毛泽东在悬念中赴渝

面对国民党的舆论压力,《新华日报》8月24日发表署名“莫一尘”的文章《解决问题的关键》,文中说民主改革等问题不解决,“一切谈判都将是空的,毛先生出来也没有用”。文章批评强调毛泽东一定要亲赴重庆“显然

蓄着一个很大的阴谋”,并以政治犯遭关押,政党无合法地位和特务横行暗示毛泽东赴重庆不安全。

延安内部也为毛泽东的安全和健康担心,反对毛泽东赴重庆。

国民党方面普遍预计毛泽东不会亲赴重庆,故《中央日报》定下的宣传方针是“假戏真做”。在蒋介石的邀请电发出后,双方反而剑拔弩张,相互指责。毛泽东是否赴重庆,和谈能否进行,成为一大悬念。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褚辅成致蒋介石电要求蒋“再电毛泽东劝驾,窃恐未必肯来”。

在充满悬念的期待中,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这一消息震撼重庆全城,引发新闻界和公众的极大热情,立即产生了轰动效应。

《大公报》记者子冈写道:“人们不少有接飞机的经验,然而谁也能说出昨天九龙坡机场迎接毛泽东是一种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而重庆的新闻传媒则直接采用了诸如《毛泽东先生来了!》、《毛泽东到了重庆》这样的社论标题,对毛泽东到重庆的意义深切关注并大肆渲染。

(据《老年生活报》)